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汪佩伟
编

江亢虎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汪佩伟
编

江亢虎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江亢虎卷/汪佩伟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639-4

I. ①中… II. ①汪…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江亢虎 (1883~1954)-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5909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江亢虎卷

汪佩伟 编

Jiang Kanghu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32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13 000

定 价 7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 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 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 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导言

一、江亢虎其人

江亢虎(1883—1954),祖籍安徽旌德,于1883年7月18日(光绪九年六月十五日)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城西的陶湾江家村。在其兄弟六人中,排行老大。

江亢虎原名江绍铨,字康瓠。后因1911年在杭州演讲《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时,被清廷视为“洪水猛兽”,故1913年江30岁生日在上海出版其文集《洪水集》时,署名江亢虎,并自称:“江洪水也,虎猛兽也,不亦宜乎?”

江亢虎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末之前,对于中国近代的政治史、思想史和政党史,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而江亢虎本人,则是中国近代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

何谓“复杂多变”?概括地说,我们可以将江亢虎生平及思想变化的轨迹,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1. 早年江亢虎,从一个封建主义的“官二代”(或曰“官三代”),转变成为“光绪庚子后北京社会上倡导维新运动之一人”(梁漱溟20世纪40年代语)。

江亢虎出身于仕宦之家。祖父江澍昀(1830—1892),原名钟璜,字韵涛,1877年(光绪三年)进士。曾入翰林院任编修,后任职户部、顺天乡试同考官、甘肃壬午(1882年)科主考,1890年任山东登州知府,两年多后在此任上去世。

父亲江德宣(1854—1910),字孝涛(一为小涛),1886年(光绪

十二年）进士。曾任工部主事，保升员外郎加四品衔，在京师供职二十年后外放到江苏，任江宁知府，亦病逝于任上。

外舅刘幹卿（1846—1910），字启翰，系河南南阳知府刘拱宸的二子。1876年（光绪二年）中举，嗣后在京城任户部员外郎，又外放为湖南候补道，总办湖南厘金局、官矿局。为官近四十年，一生敬业、清廉。刘幹卿将其二女刘云寿嫁与江亢虎为妻，故既是江的外舅，又是他后来的岳父。刘对江瞩望甚高。

江亢虎的幼年时代，即是在其祖父、父亲和外舅（后来的岳父）家里度过的，从小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教育。他酷爱学习，“自十岁，即属文字”，“昕夕一编不暂释手”；“幼读《礼运》，慕天下为公之义”。他十分聪颖，能过目成诵，记忆力颇佳，领悟力亦强。尤其是在北京，少年江亢虎目睹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危机、戊戌维新变法的昙花一现，以及庚子之役八国联军对京城进行蹂躏后的惨状，使他“困于心，衡于虑，惕然而自危，蹶然而思奋”。

2. “弱冠”前后的江亢虎，从一名主张社会变革、救亡图存的具有强烈革新意识的维新人士，转变成为一个追求“三无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

20世纪初年，江亢虎三次留学日本（1901年、1902年至1903年、1907年），同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交换过意见，并深受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影响。在几次回国生活和工作期间，江亢虎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妇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思想主张，特别是在北京还创办了三所“女学传习所”（女子学校）。

但事实上，作为一名新派人士，年轻的江亢虎当时思想上所追求的，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1903年，弱冠之年的江亢虎在日本“标新立异”，提出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但此说除张继外，“无应和者”，故回国后也“从不敢以示人”。

六年以后，1909年4月17日，江亢虎在法国巴黎出版发行的中文无政府主义杂志《新世纪》第93号上，公开发表了《无家庭主义》一文。文章的署名为“某君来稿”，引语中假托此文为“亡友徐君安诚之遗墨”，此系“为之代传”。江亢虎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自己在国内引起麻烦。5月15日，江再次投稿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营业管见》一文，又发表在《新世纪》第97号上。

接着，1910年在游学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时，江亢虎于7月撰写

了《无家庭主义意见书》，对自己1903年以来所形成的“三无主义”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建立了以“破除家庭”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此文当时曾译有英文、法文文本，受到各国社会党人的欢迎。该文提出的“无家庭主义”，包括自由恋爱、公共教养和废除遗产等三个要点。

可见，就其思想根底来看，江亢虎在20世纪的头十年，实际上是一个追求“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无政府主义者。

3. 30岁前后的江亢虎，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认同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

1910年4月至1911年春季，江亢虎做了他自称的“世界之旅”。这次出国，历时整整一年。他取道日本转赴欧洲，先后游历、访学于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俄国等，最后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国内。

在旅欧期间，江亢虎广泛地接触了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幸德秋水、片山潜、堺利彦等日本社会主义先驱，以及当时在欧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张继、吴稚晖、褚民谊等人。1910年，他还以非正式代表的资格出席了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会议。此时，在思想上，江亢虎已经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1911年回国后不久，江亢虎即公开揭橥“社会主义”的旗帜，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成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之勃兴和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之开创的第一人。例如：

他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1911年6月1日（端午节），应杭州“惠兴女学”主持人的邀请，江亢虎在杭州女学联合会演讲《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此为国内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一时官绅大哗”，浙江巡抚增韫派军警干涉禁止，将演讲的印刷文本悉数销毁，将江“驱逐出境”，并电奏朝廷，称此讲演“非圣无法，祸甚于洪水猛兽”，要求将江革职逮捕。

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建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张家花园举行，近四百人出席，二十人演说，当场加入研究会的约五十人。作为发起人，江宣布了该会的宗旨，并在演讲中针对社会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怀疑”进行了解读。与此同时，研究会还发布了宣言。在这个中国近代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宣言书中，江亢虎称社会主义为“正大光明之主义、大同之主义、世

界通行之主义、人类共有之主义”，宣告研究会的宗旨和任务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

他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也是在1911年7月10日，江亢虎创办的杂志《社会星》刊行。该刊第一、二号（期）文章，均系江一个人的手笔，第三号（期）则因病由其他人代理。杂志仅出三号（期）后即被当局查禁。在杂志的发刊词中，江声称该刊为中国“社会主义最初惟一之言论机关”，并宣布杂志的任务有四：“输布全世界广义的社会主义之学说”，“详载内外国社会主义进行者或反对者及一切与有关系之事情”，“发挥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交通中国近日社会主义之言论”。9月，《社会星》被迫停刊后，由上海惜阴公会又推出《社会》杂志，江为其撰写了发刊词，其中的“祝词”为：“社会主义，纵贯永劫，横行寰宇，以覆载为量，与日月同寿，永不消磨，至人类灭绝时；《社会》杂志，亦纵贯永劫，横行寰宇，以覆载为量，与日月同寿，永不消磨，永不停止，至人类灭绝时。又更其词曰：《社会》杂志可以停止，社会主义不可以消磨。《社会》杂志出一册，社会主义得一册之鼓吹；《社会》杂志著一字，社会主义得一字之鼓吹。乃至不出一册，不著一字，而社会主义之精神，幻为无量数《社会》杂志之化身，永不消磨，永不停止，至人类灭绝时。”

他还创建了国内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政党“中国社会党”。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的名义，召集特别会议，改“社会主义研究会”为“中国社会党”，并撰写、公布了党纲八条和规章。在会议上，江亢虎被推举为中国社会党本部部长。8日，上海《民立报》报道了中国社会党成立的消息。10日，江任总编辑的《社会》杂志第2期发布了《中国社会党宣告》，称该党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初惟一之团体机关”。该党自成立至1913年8月被袁世凯通令解散，其存续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它在全国拥有400多个支部，共约52万党员，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

对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热情宣传和大力鼓吹，对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发起和努力推动，使江亢虎在民元前后俨然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师”，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

4. 40岁以后的江亢虎，从一位社会主义的宣传“大师”，转变成为

一个力图与北洋军阀及其政府合作以实行其思想理论主张的政客。

1913年8月，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被袁世凯通令解散。随后，江亢虎先去了日本，在头山满家里拜见了当时住在那里的孙中山，并携带孙中山为他写的两封介绍信，于当年秋冬时节抵达美国。在加州，江亢虎接替退休的原英国在华传教士傅兰雅，在加州大学担任中文讲师，直至1920年夏偕夫人卢岫霏回国。

在美七年期间，除了在加州大学任教，江亢虎广泛地接触了美国的和在美国的各国社会主义者，并积极参加了他们的集会、演讲等活动。他还撰写了许多文章，回顾、反思中国社会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得失。1920年回国的首要目的，是要前往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实地考察苏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资借鉴。从1921年6月至1922年4月，他游历、访问了苏俄十个月，随后到德国、荷兰和法国等国考察、访问，还参加了第二国际的会议。

回到国内的第二年，即1923年，江亢虎正好进入他人生40岁的中年时期。此时，他自称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学说和主张，是他“半生来学问思辨之结果”。他认为：“吾人自信非至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充分施行，更无他主义起而相代”；“此两新主义必将代表一时代之精神，独占全世界之舞台”。所以，归国后，江亢虎先后到全国各地演讲、授课，鼓吹他的学说和主张。江亢虎留给国人的印象，仍然是一位“社会主义大师”。

但是，从政治上看，江亢虎对中国南方兴起的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持断然反对的态度。他认为借助外力（苏俄），导致“赤祸”蔓延，这是十分危险的，不可取。他说：“革命事业，当以人民自觉、自动、自决为原则，以民党自身养成之根本势力为先锋。若在我本无可恃，而利用国内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乱，其利用国外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亡。”

然而，对于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包括各南北军阀，江亢虎实际上采取了合作的态度。他多次写信给各省当局，包括东北张作霖、云南唐继尧、湖南赵恒惕、湖北萧耀南、山西阎锡山、广东陈炯明、浙江夏超等，希望各省能“一试”其两主义之“政见”。随信还附上其《请愿十条》，并表示拟带学生二三人，愿往各省演讲，并“晋谒而谈”。他还接受北京北洋军阀政府的邀请，以“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的社会名流的身份参加了“善后会议”，并担任会议的制宪委员会委员。在这个时期，他恢复和“复活”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党（更名为“中国新社

会民主党”），作为推行自己的理念并参加政治活动的依托。此时，他还涉嫌金梁、康有为等人的“甲子阴谋复辟案”，受到南方大学师生的讨伐和社会正义人士的批判。

1927年夏季，当南方国民革命的旗帜插遍了大半个中国之际，江亢虎不得不解散了其“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前往美国任职于国会图书馆。1930年，他又辞去在美国的工作，前往加拿大，应聘担任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和汉学系主任教授，直至1934年夏回国。

5. 50岁以后的江亢虎，从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堕落成为一个可耻的汪伪汉奸。

1934年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任教约五年后，江亢虎回到国内。在加拿大的约五年里，他培养了五名中国学的硕士研究生，给数千名美国和加拿大学生讲授了中国文化的课程。教授江亢虎在北美传播中国文化是作出了贡献的。

这次回国的江亢虎，时年51岁。他先住在上海，后又迁到北京。回国后，他虽自称“以社会改造、文化复兴和个人修养三事为旨归”，但对于政治问题，实际上他是回避不了的。这个时期国内最大的政治，就是如何应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问题。七七事变发生时，江亢虎正在京城。平、津陷落以后，他转赴西南，先是在四川、西康游历、讲学，后从成都飞往云南。在云南，1937年11月1日，他在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此次抗战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而且是“为世界和平而抗战”，“为人类公理而抗战”，“为反帝国主义而抗战”，“为东方文化而抗战”，“为同情国民而抗战”。作为一位知名的“海归”大学教授，江亢虎对抗战意义的认识，确实不同于一般人，或者说确实高于常人。

但是，仅仅一年多以后，1939年3月，匿居香港的汪精卫接见了当时也寓居香港的江亢虎，“坚约参加和平运动”；9月，回到上海的汪精卫电邀在港的江亢虎赴沪，参加汪伪阵营。江接受了汪的邀请，同月自香港抵达上海，并于10月10日发布《时局宣言》，将日本军国主义奉为“东亚集团”的“领袖”，公开宣布了自己投敌卖国的汉奸立场。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江亢虎出任伪考试院副院长兼铨叙部部长，并成为汪伪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列席委员”。1942年3月，江亢虎正式接替汉奸王揖唐，就任伪考试

院院长，并同时升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直至1945年汪伪政权覆灭。汉奸江亢虎在抗战胜利以后，经审判被国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江从南京被转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于1954年因病死于狱中。

综上所述，江亢虎的一生复杂多变。这是不难理解的。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矛盾、阶级分化、社会危机、文化冲突和思想碰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江亢虎的一生，政治立场上的不断转变，思想理论上的逐步演变，反映的正是中国近代社会风云的起伏跌宕。

对于江亢虎其人的评价，目前笔者仍然坚持拙著《江亢虎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中对江亢虎所做的“分阶段”进行评判的研究方法，以及对他作出的早、中、晚等“三个时期”的基本评价，即：从四品京官到“社会主义大师”的早期（1883—1919），从“社会主义”倡导者到沦为一个政客的中期（1920—1938），作为民族败类、可耻汉奸的晚期（1939—1954）。在这里，笔者还想对江亢虎的“生平事迹”，再提出几点概括性的认识和意见：

其一，从清末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末堕落为可耻的汉奸之前，江亢虎无疑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包括向第二国际和苏俄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其二，江亢虎是中国近代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正如毛泽东1956年所说，“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活动，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反映。

其三，江亢虎“他在中国也是为寻求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联系和将男女教育平等运动带入中国的开路先锋之一”（[美]施乐伯、于子桥语）。

其四，作为一个可耻的汉奸卖国贼，江亢虎是民国历史上寡廉鲜耻的“文化巨奸”之一。他的所谓“回向东方”的汉奸理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其五，在抗战时期堕落成为民族败类之前，江亢虎周游列国，到处演讲，四处讲学，著述丰硕，是20、30年代著名的政客、思想家、文化人之一。他的早期维新思想、妇女解放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教育思想等，为中国近代留下了十分有益的思想资料。

二、江亢虎的思想

江亢虎的思想，择其要者，约有数端。

1. 早期维新思想

20世纪初年，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年仅十七八岁的江亢虎在北京发起成立智学会，创办《爱国报》（周刊），向国人宣传爱国言论，弘扬爱国精神，号召中国人做国家的“主人翁”。他提出了“以智强国”的主张，提倡办学堂，设报馆，开讲座，翻译新书，印刷新书，设议事处等。他强调中国不能闭关自守，认为“闭关自守之策，只能行于六十年以前，而断不能持之于今日。今日之天下，列国之天下，非一统之天下也”。这样，江亢虎的早期维新思想，便建立在爱国、救亡、开放的基础之上。

江亢虎的维新思想，除了当时他提出的关于内政、外交的不少主张外，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中国教育改革问题的认识上。他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主张，并付诸实施，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他对教育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治标”，而治标的方法，首在“练兵”；“其治本方策，则端在兴学”，因为“未有民智不开而能长富强者，亦未有民智既开而不太富强者”。所以，办教育、出人才是“万世之长计”，“治本方策”（1901年《与袁慰廷书》）。

他提出对中国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整顿。他认为，目前各省的学务处，懒人冗官众多，“甚或反为学务阻力之源泉”，因此，建议学部撤销学务处，免掉“学政”这一“赘疣”，另设“视学官”来代替。（参见1904年《请各省设视学官议》）江的建议，得到了学部的肯定和采纳。他还建议成立全国和地方的各级“教育会”，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教育行政的辅助机关。（参见1904年《请立全国教育会议》）此议后来也得到了学部的采纳。他对教材、教员和文字改革等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主张。

他认为中国教育的办学目的需要转变。为此，必须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将“学而优则仕”的“劣根性”，转变为以“教育普及”为目的。（参见1904年《学堂毕业但发文凭不给出身不奖官职议》）